

开放的文化观念 及其他

—— 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耿云志 等 著

陈于武 编



Open Cultural Values And Others

Commemorat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他

——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耿云志等著 陈于武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他: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耿云志等著;陈于武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5013 - 3974 - 7

I. 开… II. ①耿…②陈… III. 新文化运动—研究 IV. 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690 号

书名 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他——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著者 耿云志等著 陈于武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25

字数 485 千字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974 - 7

定价 59 元

目 录

开放的文化观念

——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辞(代序)

..... 耿云志(1)

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耿云志(4)

涟漪重叠:“五四”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 罗志田(28)

文化开放时代的精神进化

——以“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化观为中心 梁景和(50)

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 许纪霖(64)

“五四”新思潮倡导力量的形成与聚合途径初探

——以《甲寅》、《新青年》撰稿人为中心的考察 杨 琥(84)

试论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 陈方正(148)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汉字改革

——为汉字说句公道话 周质平(173)

“五四”前后现代大学理念的阐发及其制度建构 左玉河(188)

“五四”余影下的儒学透视 孙 郁(224)

从民权到威权:试论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变异 张朋园(232)

胡适与赫胥黎 黄克武(240)

胡适研究在俄罗斯(苏联)(1923——2007) 路文力(272)

“五四”新文化思潮分化之初探

——以周恩来评胡适的文章为例 史革新(281)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论析 冯天瑜(297)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丁文江 欧阳哲生(319)

张君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辨正

——以“科玄论战”为中点的再考察 翁贺凯(337)

晚清精英文化心态的逐步开放 邹小站(364)

遗忘、忽略还是其他:从晚清传教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讨论

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影响说起.....	熊月之(386)
晚清帝国对“万国公法”的理解和认识	王中江(395)
开放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的两重世界 ...	李长莉(432)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郑师渠(45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	郑大华 周元刚(499)

开放的文化观念

——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辞

(代序)

耿云志

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朋友:

我们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办的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以“开放的文化观念”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半年的筹备,今天在这里顺利举行。我和我们学会的同人衷心地欢迎各位朋友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里,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

我们这次研讨会会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我们是专门为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而举办此会。在此以前,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各地,都只举行过纪念“五四”的学术研讨会,而从未闻有专门纪念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研讨会。我一直以为,“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虽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终究不是一回事。“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对固有文化进行批评和反省,同时努力追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密接,相互融合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应因为他们有密切关系,就将两者混为一谈。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从长远处着想,很可能这个新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就我所知,我们这次会,很可能是迄今为止,第一次专门为纪念新文化运动而举行的学术会议。

第二,大家来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这次研讨会,是一次规模很小,但层次很高的研讨会。与会学者不超过三十人,但所有与会学者都是各自领域里有影响力,有权威性的学者,都是学术精英,或者说是领袖级学者。这就使我们的研讨会可以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并且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个人一直希望举办这样规模小而层次高的研讨会,这样可以使讨论更加集中和深入,与会者不必分组,可以始终参与整个研讨会的全过程。我想,这样的研讨会,其效果无论是对会议而言,还是对每一位与会学者而言,都是比较好的。

第三,我们这次研讨会是纯粹的学术聚会,一切与学术本身没有关系,或没有密切关系的通常的会议形式,我们都一概免除。我们不设主席台,没有开幕式和闭幕式,在我作这样一个简要的引言之后,立即进入学术讨论。我相信,这样的组织方式,会得到与会各位朋友的认可。

在讲了此次会议的几个特点之后,我想再就本次会议的主题略说几句。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主题,大体基于以下的考虑:

一、在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时代,包括有清一代,通常情况下,文化是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统治集团有意推行一种国策,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动摇而加意固守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容许任何新奇的东西来干扰,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对外封闭的政策。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这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可能更有影响力和束缚力。这一方面就是,数千年来,由于中国文化从未受过在整体上比它更高的外来文化的挑战,所以大家有一种牢固的文化优越感,从不知道,也从不承认在中国之外,还有更高度发展的文化。因此,对于自己不了解的外来文化,总是本能地以蛮夷视之,不肯平等看待,更不肯虚心学习,养成封闭的文化心态。

二、鸦片战争后,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了,中国人封闭的生存状态改变了,随之,封闭的文化心态也慢慢地发生改变。先是极少数的人,在某些层面上,逐渐认识西方文化的某些长处,产生学习、效法的愿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例如经贸往来的增加,人员交流(使臣、留学、游历等)的增加,西书的翻译等等,改变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直到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人,主要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文化开放的观念。他们已不再为所谓“夷夏之防”或“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所束缚,克服了中西文化问题上的种种困惑,达到了较深刻的文化觉醒。他们认识到,中国人必须学会与自己从前所不了解的新世界打交道和共处,学习一切于己有用的东西,变换自己的观念,创造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这就是中国人走出封闭,渐渐形成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加以反省和总结。

三、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开放有利于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构建和谐有序的世界,有利于人类文化的总体进步。

因此,我们纪念新文化运动,要继承和发扬文化开放的思想传统。要充分理性

地认识世界化发展的大趋势,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充分摄取,积极贡献,在世界的发展中,谋求自己的发展,用自己的发展去丰富和推动世界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基本想法。

我真诚地希望此次会议取得成功!

祝愿各位朋友在这里过得愉快!

2007年7月3日

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 密接关系的努力

耿云志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文化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且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文化在整体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未有任何其他的文化在整体上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由这样长久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认同，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优越感。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多少从周边民族那里吸收了某些东西，但总体上，中国人在文化上是自满自足的。这种文化心态相当的根深蒂固。晚明时起，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带来一些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新知识，引起少数上层士大夫的注意。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总之，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在中国之外，还有可以和中国比肩并立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可以和中国文化比肩并立的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之后，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一种造成了足以打败中国的种种条件的强势文化，逐渐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中国人通过历次的挫折、失败，逐渐认识到这些条件，认识到它们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从而引导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透过表面，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

这个过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值得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思想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的近代发展是因地理大发现而刺激起来的。中国的近代

觉醒也是同地理观念的大变化紧密相关的。中国人一向自以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有其他国家和民族向中国学习,而无中国人向其他民族学习的道理。所谓只能“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自从林则徐编《四洲志》,到魏源编《海国图志》,再到徐继畲编《瀛环志略》,中国读书人始稍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也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书里,还多多少少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表明他们决非古之夷狄可比。梁廷枏所编《合省国说》竟对历史不足百年的美国的政教制度称赞有加。这些书籍恰恰是给中国第一代政治改革家们提供精神滋养的重要原料,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忆及《瀛环志略》这本书。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陆续派出使臣和留学生,还有许多官员和民间人士出国考察、游历。他们带回了异国的亲见亲闻,更充实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新的世界观。

王韬是少数亲身游历过西方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认识到“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扣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①。他并且认定,“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②。既然“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③,就只有谋求共处之道,并进而取长补短,增益所不能,以求竞存于诸国并立的世界之中。

破除一统天下的旧观念,正视诸国并立,互相竞争的新局面,这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在观念上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有了这一变化,才会酝酿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上书中,累次痛论天下各国并立的世局,并指出其意义,提出因应之道。康氏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

① 《变法(中)》,《致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② 《睦邻》,同上书,第23页。

③ 《变法自强(下)》,同上书,第32页。

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①。这在地球未辟，泰西诸国未来中国之前，尚可维持。但大地已通，诸强环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实不容再沿袭旧日之成规。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②康有为所讲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这也正是他变法思想之所由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他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③康氏把世界大通，诸国并立视为数千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因应这一变局，必须学习欧美诸国的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才勉能争存于世。所谓新政、新法、新学、新器，包括了文化的诸多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在康有为这位变法运动的领袖那里，已萌生了近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文化观念。

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比他的老师更加清晰。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④他又说：“地球之面积日缩日小，而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⑤“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此语最能表现出梁氏对世界化大趋势的感受。所以，梁氏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151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同上书，第149—150页。

③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同上书，第222页。

④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4页。

⑤ 《论美菲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同上书，第1页。

不但是提出建立民族国家之第一人,也是明确提出中国应成为“世界的国家”的第一人。他在为推翻清王朝后最初建立的民国政府规划“立国大方针”时,提出第一项大方针就是建立“世界的国家”。^①不消说,一个“世界的国家”,其文化的方针必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其实,从《时务报》时期起,经《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直到《国风报》,整个清末十几年中,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和文化开放主义,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主导线索。

文化的发展因相互交流而得益,促其进步愈速。这一点,李鸿章也已有所认识。他曾说:“一国之见识无多,聪明有限,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益进,知识愈开。国家亦然。或者格物的新理,制造的新式,其始,本一国独得之秘;自彼此往来,于是他国皆能通晓效法。此皆各国交际的益处。”^②从他的话里不难看出,他的见解有明显的局限,他还只是看到格物制器之类的领域。后来的改革家们就进一步看到政教制度,乃至整个文化各领域,都可从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进步。清末的最后几年,因革命与立宪改革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已呈现出颇为开放的气象。只是因为政治变革主导一切的形势,于文化的全方位的开放,尚未成为知识界充分自觉的意识。

辛亥革命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但并未因此换来民主制度的实现,反而出现政治失序,乱象迭出的局面。人们集中心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奔走革命与改革,结果竟是如此令人失望。挫折与失望,促使人们反省。比较最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们,乃得出结论,认为政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真正发生变化。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绝大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制臭味”。所以,他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

^① 《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同上书,第40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6卷,商务印书馆1921年影印本,第13页。

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①。显然，要做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洗刷工夫，就必须做一番思想启蒙的工作，也就是做一番文化革新的工夫。当时有许多先觉分子与陈独秀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就连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看到，国民中“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仍然很少。“欲使其心有共和思想，不为反对，必须以心感动之，同化之”^②。所谓“以心感动之，同化之”，也是要做一番思想革新的事业。梁启超更明确要放弃政治活动，专注心力于革新国民思想的工作。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宣布说，“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③。著名大记者黄远庸认为，积清末以来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与更代，至此已到了真正关键的时期，“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④。最后，充分尊重人类之意志自由的新思想必将战而胜之。胡适更从文化整体变动的宏观考察提出，中国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⑤。

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的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例外地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①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3卷3号。

② 孙中山：《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74页。

③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4页。

④ 《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本，第154页。

⑤ 《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8页。

二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由文学革命运动拉开大幕的。文学革命的开篇之作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紧接着,在2卷6号上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从此,引发了渐趋热烈的讨论与争论。数年来因政治失序,思想昏乱而造成的局面,显出一线豁然开朗的曙光。

清末十几年由政治革命与改革所带动起来的文化革新潮流,大体上主要是受日本思想界与文化潮流的影响,这时期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经过日本的中介而传入中国的。到了文学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一则因为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感;二则因为这时留学欧美的青年成批地回国。中国的教育界、思想文化界生成了一股新的生力军。从此,由这股生力军担当主要角色,直接从西方输入新学新理成了中国与世界新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这股生力军的一些领袖分子,对此有非常明晰的自觉意识。这可从世界丛书社的酝酿和形成看得很清楚。

1917年10月18日,回国刚刚四个月的蒋梦麟写信给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同门师弟胡适,提出他的一项大计划,要系统编译出版一套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丛书。因这是迄今所见有关这一计划的第一份文献,故将此信的全文引录如下:

适之足下:前自杭寄奉一书,并附剪报一纸,谅邀台览。弟自杭返后,聆各省教育代表之伟论,咸谓吾国所出新书,无一可读。研究西文,究非易举,皆抱脑中饥饿之叹。又参观上级学校,教员皆不读书。诘之,则多以无书可读对。故不喜读书者,则竟不读一书;喜读书者,则多读古书。窃谓吾辈留学生,可得新知识于西书,旧知识于古籍。若不通西文者,则除读古籍外,其又何道以得新知识?若是以往,中国文化前途不堪设想。弟实忧之。于是,商之于商务印书馆主事诸公,请编辑高等学问之书籍。主事诸公以此种书籍于营业上不利,

颇觉为难。厥后彼此协商，允先行试办。虽略损资本，以吾国文化前途故，亦不敢辞。同事中如张菊生、高梦旦诸公，均赞成斯义。诸公以他事羁身，不克兼顾。其势必由弟承乏。故拟邀集同志故交，以进步之精神，协力输入欧西基本之文化。昔大隈伯诸人，倡译书社，欧化遂得以输入日本。吾国学术之衰落，至今日已极，非吾辈出为提倡，其谁挽此狂澜乎？吾兄文章学术高出侪辈。此事非大家帮忙不可。请兄于课余之暇，著书立说，弟当效校阅之劳。一切筹谢方法，可后议。弟意，吾兄可先将加校之博士论文付印；以后可择兄之所乐为者，彼此接协办理。兄素长哲学，可于此一门发挥宏论。他若达善诸君，可各以所长著译。弟拟以北京、南京、上海、广东为四中心。北京一方面，必须烦劳吾兄及独秀先生。子民老师处，当另函述明。商务以伟大之资本，全国五十余处之分行，印刷、发行均甚便利。吾辈若不善为利用，殊若可惜。弟学识肤浅，惟区区之心，不容苟安过去。故不推绵力，函求同志。吾兄素抱昌明学术之志，想必赞同斯举。将来出版、装订及作索引（Index）、点句等，均当以进步之精神，最新之方法行之。一人作事，东扶西倒。请兄速赐复音，并示高见。^①这封信里，有如下几点颇关重要：

一、蒋氏归国后，发现国内有学问饥荒之象。^②不喜读书者，一书不读；喜读书者，多读古书。因新出版之书“无一可读”。如此，则人们欲求新知识，无路可达。这种情况是引发他要编译出版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系列丛书的根本动因。

二、他向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提出上述设想，该馆以出版此类丛书，于营业上不利，对其建议表示为难。后考虑其学术与文化上的意义与价

^① 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卷，黄山书社，1994年，第402—405页。

^② 蒋氏的观察与胡适的观察相当一致。胡适1917年7月归国，在上海停留十几天，他逛过许多书肆后发现，号称中国最开放的城市的出版界，“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他不禁感叹道：“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可吃了。”（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4，第4—5页）

值,乃勉允试办。但该馆不拟抽出人力帮办此事,而任令蒋氏自行筹划。

三、蒋氏第一个寻求帮助的人是胡适。胡与蒋在美国同受杜威指导,谊属同门。蒋对胡的学问很佩服。加之,这时由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胡适的名声亦悄然鹊起。所以他相信胡适的支持是不可少的。但这时他主要是把胡适作为该丛书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而不是主要的组织者。

四、蒋氏颇具雄心,他准备在北京、南京、上海、广东分别建立中心,吸集人才,从事编译。而北京一方面,初期要拜托胡适与陈独秀帮忙筹划。

11月12日,蒋梦麟又致胡适一书。此信内容亦甚重要,且附有一份编译丛书的简章,录如下:

适之足下:前快邮上一书,未蒙赐复,念甚。因课忙无暇作复欤?抑以弟之鄙陋,不足以赐教欤?今午,由高梦旦先生交下章行严先生书,藉悉北京大学有编辑高等学术书籍之举。其办法与弟所拟者大致相同,不谋而合,可彼此协商进行。鄙意,此事可分四区进行:(一)北京,(二)上海,(三)南京,(四)广东。留学界中亦须分头函达。北京一方面,则已有章先生主持;而南京一方面,当托国立高等师范诸君;广东则亦有国立高师敝友程祖彝君为教务长,弟当往托之。北京诸公如不弃鄙陋,则弟当竭其绵力,随诸公之后,彼此商定书名若干,分头觅人编译。凡译某书,须彼此通知,以免重复;又每书必须用中西索引(Index),并吾兄所用之点句法,以为出版界倡。兹将张菊生、高梦旦二先生及弟所共拟之办法抄奉,乞赐教为禱。^①

蒋氏与张、高两位商务印书馆主事的前辈商议的简要章程初名为《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其所拟条目如下:

(一)《高等学术参考丛书》以西洋之高等学术为主体;中国之高等学术以西洋科学方法著述者并入之;为高级学校及研究高等学术者之参考及涉猎之用。

^①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卷,第406页。

(二)本丛书以西洋基本学术之关于哲学、教育、群学、文学四类为限。

(三)本丛书四大类之分门如下：

(1)哲学类：(a)哲学史门，(b)哲学门，(c)知识方法门。

(2)教育类：(a)教育史门，(b)教育原理门，(c)教育行政门，(d)教授法
门。

(3)文学类：(a)中国文学史门，(b)西洋文学史门，(c)文学比较门。

(4)群学类：(a)群学门，(b)史学门，(c)政治比较学门。

(四)本丛书著作之责任由著作人负之；印刷发行之责任，由发起人负之。

(五)发行人照下列版税为著作人之报酬：撰著书，版税照定价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翻译书，版税照定价百分之十至十五。

(六)每册假定十万字，约百页，即二百面，定价假定七角左右。

(七)版税每年阴历三节，照实销之数，由发起人交付著作人，另立折据为凭。

(八)著作权为著作人之所有，但归发行人一家印刷发行。

(九)已印之书如有修订内容或变更形式及定价等事，双方协定之。

(十)各书之版权须由著作人加盖图章或粘贴印花，以便稽查销数。^①

在上引蒋梦麟致胡适的信里，提到章行严即章士钊寄交商务印书馆一份北京大学拟编译高等学术书籍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我们无法得知。^② 但我们知道章士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可能是策划这个文件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提出过许多建议，因而颇受蔡元培校长倚重的胡适，应该会参与其事。这件事反映出，在当时，大力翻译西书，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是知识界先觉者们的共识。

上面引录的由蒋梦麟与商务印书馆主事者张元济、高梦旦共同拟议的编译丛

① 此附件在上引书实施照排时，被遗漏。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② 查6巨册的《北京大学史料》中，无此项记载。